

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

柴晓运¹ 郭海英¹ 林丹华^{**1} 刘影² 苏双¹

(¹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 100875) (²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以 639 名流动儿童为被试, 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 (1) 认知重评既直接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又能通过自尊和心理弹性及自尊→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2) 表达抑制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不显著, 但通过负向预测自尊和心理弹性及自尊→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流动儿童 情绪调节 自尊 心理弹性 主观幸福感

1 引言

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 1367 万人(教育部, 2016), 这类随迁子女群体也被称之为“流动儿童”。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 学者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和身心健康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多以“问题与缺陷视角”为主, 对该群体积极心理品质发展的关注较少(申继亮, 刘霞, 赵景欣, 师保国, 2015)。

积极青少年发展观指出, 青少年的发展是可塑的, 即使是处境不利的青少年, 也有积极发展的潜能(Lerner, Lerner, Bowers, & Geldhof, 2015)。主观幸福感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主观评价, 包括情感和认知两种主要成分(Diener, 2009)。先前研究发现, 人格特质(如神经质)、自尊、自我控制感及家庭功能、同伴关系和学校环境氛围是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丁新华, 王极盛, 2004; Lee & Yoo, 2015)。而在流动儿童领域, 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歧视、社会排斥、自尊和群体认同感等(刘霞, 赵景欣, 申继亮, 2013; 师保国, 徐玲, 许晶晶, 2009; 王芳, 师保国, 2014)。与此同时, 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利处境, 如流动性、歧视知觉和同伴侵害等显著增加了其抑郁和孤独感等情绪问题(侯舒朦, 袁晓娇, 刘杨, 蔺秀云, 方晓义, 2011; Ye

et al., 2016), 进而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因此, 如何通过情绪调节减轻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是提升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一条重要路径。

情绪调节主要指个体调节情绪体验的效价、持续时间和强度的能力(Gratz & Roemer, 2004; Gross, 1998)。在情绪调节策略中, 较常用且广受研究者关注的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Gross, 1998; 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是通过改变对潜在的情绪诱发情境的解释来进行情绪调节, 表达抑制则通过阻止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来达到情绪调节的目的(Gross, 1998)。以往研究发现, 在保持身心健康方面, 认知重评可能比表达抑制更好(Gross & John, 2003; Hughes, Gullone, & Watson, 2011)。如一项跨文化研究发现, 认知重评与低抑郁和高生活满意度有关, 而表达抑制则伴随着高抑郁和低生活满意度(Haga, Kraft, & Corby, 2009)。但也有研究者发现, 表达抑制的作用存在文化差异, 如在中国文化中, 抑制情绪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功能(刘影, 桑标, 龚少英, 丁雪辰, 潘婷婷, 2016; Aldao, 2013)。总体而言, 认知重评与积极的心理适应结果(如主观幸福感)相关, 表达抑制与消极的心理适应相关(程利, 袁加锦, 何媛媛, 李红, 2009)。那么情绪调节策略如何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呢? 故本研究拟探索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积极发展体系研究)(15ZDB138)和 2015 年度北京市共建科研项目(情绪调节干预对早期虐待经历儿童的作用: 生理-神经机制-行为等多水平的干预效果评估)的资助。

** 通讯作者: 林丹华。E-mail: danhualin@b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111

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自尊是自我积极发展的重要方面,高自尊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能力和价值有积极的态度(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元分析表明,高自尊可以提高个体应对逆境的能力,是主观幸福感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且具有跨文化一致性(Cai, Wu, & Brown, 2009)。横断研究发现,高自尊有助于增强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和主观幸福感(郝振,崔丽娟,2014)。同时,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又对个体的自尊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认知重评与高自尊相关,表达抑制与低自尊相关(Gross & John, 2003)。追踪研究也表明,个体每天高频使用认知重评,就可能拥有更高的自尊和更好的心理适应,而表达抑制则相反(Nezlek & Kuppens, 2008)。由此推论,自尊可能是情绪调节策略预测青少年心理发展结果的中介。但国内对流动儿童自尊影响因素的探究,主要集中在歧视知觉和社会支持(郝振,崔丽娟,2014;王芳,师保国,2014)等与外部环境有关的变量,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关注较少。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自尊在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中起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指在经历逆境后,个体具有的恢复并保持良好的适应系统功能的能力(Masten, 2014)。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发现,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助于减轻抑郁、孤独等情绪问题(王中会,蔺秀云,黎燕斌,2016; Ye et al., 2016)。由此,心理弹性可能是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促进性因素之一。以往实证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干预是提升青少年心理弹性的有效方法,且认知重评是最有效的干预要素(Southwick & Charney, 2012; Wu et al., 2013)。但表达抑制对心理弹性的预测作用,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研究。从情绪的调节过程来看,表达抑制只是阻止情绪的表达行为,并没有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可能还是不利于心理弹性的发展。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还可能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儿童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如高自尊)被认为是心理弹性的重要预测变量(Wright, Masten, & Narayan, 2013)。元分析的结果也与此一致,二者的平均效应量 r 达到了.55(Lee et al., 2013)。国内研究也发现,自尊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弹性有直接预测作用(何玲,2015)。高自尊者更能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进而有助于心理弹性的发展。据此,综

合前文的文献梳理,本研究推测,流动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通过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效应预测主观幸福感,即假设3。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积极发展的视角,探索情绪调节策略与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考察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效应,以期深入揭示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式在北京市2所打工子弟小学和1所公立小学取样。选取5~6年级的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被试639人,男生348人,女生291人,五年级353人,六年级286人,平均年龄 $11.15 \pm .94$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情绪调节策略

采用王力、陆一萍和李中权(2007)编制的情绪调节量表,测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每种策略7个项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计1到7分。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88和.81。

2.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的中文版(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共10个项目,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1到4分。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69。

2.2.3 心理弹性

采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胡月琴,甘怡群,2008),共27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1到5分。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84。

2.2.4 主观幸福感

采用牛津幸福感问卷(简版)(Hills & Argyle, 2002),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有较好的信效度(郭海英等,2014)。共8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1到6分。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70。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轻共同方法变异,施测程序方面采用了使用反向题目、强调保密性等方式进行控制。同时,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发现,共有14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

因子解释的变异为 18.19%，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严重。

3 结果

3.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自尊、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达抑制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与自尊、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3.2 自尊和心理弹性在情绪调节策略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 SPSS 宏 Process 2.16 (Hayes, 2013)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如表 2 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学生类别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认知重评直接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自尊和心理弹性；自尊直接正

向预测心理弹性和主观幸福感；表达抑制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p = .12$)，对自尊和心理弹性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采用 Hayes (2013) 提供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如表 3 所示，各路径的 95% 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说明自尊和心理弹性单独的中介效应和序列中介效应均显著。

4 讨论

4.1 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情绪调节策略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即认知重评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Gross & John, 2003; Haines et al., 2016)；表达抑制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这与以往国内的部分相关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王力, 张厚粲, 李中权, 柳恒

表 1 本研究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7
1 性别 ^a	-	-							
2 学生类别 ^b	-	-	-						
3 年龄	11.15	.94	.07	.07	-				
4 认知重评	4.27	1.45	-.01	-.23**	-.01	-			
5 表达抑制	3.77	1.32	.05	-.08	-.03	.66**	-		
6 自尊	2.88	.48	-.13**	-.21**	-.03	.27**	-.06	-	
7 心理弹性	3.42	.58	-.15**	-.26**	-.03	.33**	-.09*	.69**	-
8 主观幸福感	4.44	.85	-.10*	-.19**	-.04	.26**	-.06	.63**	.65**

注：性别 a、学生类型 b 均为虚拟变量，男生 =1，女生 =0，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 =1，公立学校流动儿童 =0；** $p < .01$ ，* $p < .05$ 。

表 2 本研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自尊)				方程 2 (因变量：心理弹性)				方程 3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i>b</i>	<i>SE</i>	<i>t</i>	95% CI	<i>b</i>	<i>SE</i>	<i>t</i>	95% CI	<i>b</i>	<i>SE</i>	<i>t</i>	95% CI
年龄	-.01	.02	-.65	[-.05, .02]	-.01	.02	-.35	[-.04, .03]	-.02	.03	-.74	[-.07, .03]
性别	-.11	.03	-3.07**	[-.18, -.04]	-.07	.03	-2.15*	[-.13, -.01]	.01	.05	.18	[-.09, .11]
学生类别	-.15	.04	-3.61**	[-.23, -.07]	-.11	.04	-2.98**	[-.18, -.04]	<-.01	.05	-.08	[-.12, .11]
认知重评	.16	.02	10.00**	[.13, .19]	.14	.02	9.18**	[.11, .17]	.05	.03	1.97*	[.00, .10]
表达抑制	-.14	.02	-8.13**	[-.18, -.11]	-.13	.02	-7.78**	[-.16, -.10]	-.04	.03	-1.54	[-.10, .01]
自尊					.65	.04	18.29**	[.58, .72]	.61	.07	8.82**	[.48, .75]
心理弹性									.55	.06	8.78**	[.43, .68]
<i>R</i> ²			.20				.55				.49	
<i>F</i>			30.93**				128.01**				85.50**	

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路径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 CI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	.24	.02	[.19, .28]	82.09
认知重评→自尊→主观幸福感	.10	.02	[.07, .14]	34.48
认知重评→自尊→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	.06	.01	[.04, .08]	20.20
认知重评→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	.08	.01	[.05, .10]	27.42
总间接效应 (表达抑制→主观幸福感)	-.21	.02	[-.26, -.17]	83.32
表达抑制→自尊→主观幸福感	-.09	.02	[-.13, -.16]	34.79
表达抑制→自尊→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	-.05	.01	[-.07, -.03]	20.38
表达抑制→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	-.07	.01	[-.10, -.05]	28.15

超, 2007), 但与国外的研究结果不同 (Butler et al., 2003; Gross & John, 2003; Le & Impett, 2013)。相关分析表明,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正相关系数达到 .66。这意味着, 即使是习惯使用认知重评的流动儿童, 也可能频繁使用表达抑制, 二者可能是共存的, 而非“此消彼长”。但在控制了表达抑制策略后的回归分析发现, 认知重评的功能总体上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Hu et al., 2014), 它促使个体通过正向思维, 增加幸福体验等积极结果; 但表达抑制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不一定对个体心理适应产生直接的负性影响。如在中国, 通常将对情绪的克制等作为一种良好的习惯进行教育, 抑制情绪被赋予了积极意义 (刘影等, 2016)。尽管没有发现表达抑制对流动儿童主观幸福感显著的直接预测, 但随后的中介分析表明, 表达抑制能间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总之, 该结果既体现了认知重评适应性功能的跨文化一致性, 又体现了表达抑制功能的文化差异。

4.2 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与研究假设 1 一致。认知重评通过增强自尊而间接提升了流动儿童的幸福感受, 而表达抑制的作用则相反。这表明, 自尊是理解情绪调节预测主观幸福感机制的关键因素之一。使用认知重评频率高的个体, 对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更多采用积极的态度, 有利于促进自尊的积极发展, 进而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但依据情绪的“水压模型”, 不适当的或是长期对不良情绪表达抑制, 会导致情绪的主观体验强度增加 (如越来越难过) 和生理唤醒增强 (黄敏儿, 郭德俊, 2002)。因此, 长期使用表达抑制, 一方面掩饰了情绪反应, 并没有降低消极情绪体验, 相反可使消极情绪累积; 另一方面反映了个体对自我情绪的不接纳和回避, 总体上不利于流动儿童形成对自我的积极评价, 进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此外, 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假设 2。认知重评通过心理弹性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预测, 这与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陈琴, 王振宏, 2014)。认知重评可以使流动儿童经历高频率的积极情绪, 表现出对生活质量的满意; 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应对挑战和困难的心理资源 (Cohn, Fredrickson, Brown, Mikels, & Conway, 2009)。按照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 持续的积极情绪意味着广泛而灵活的应对方式、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毅力, 总体上增加了个人的应对资源, 也即促进了心理弹性 (Cohn et

al., 2009)。而对于惯常使用表达抑制的流动儿童而言, 负性情绪的动力性并未减弱, 会通过损害个体心理弹性的形成进而影响幸福体验。

与此同时, 本研究证实了假设 3,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均通过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效应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反映了流动儿童自尊和心理弹性的密切联系, 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 (何玲, 2015)。依照情绪调节的理论 (Gross & John, 2003), 使用认知重评会使流动儿童改变对逆境的看法, 对自己的能力更有自信, 即自尊得到了促进。高自尊会使流动儿童有更高的积极控制感, 愿意寻求帮助, 进而增加了流动儿童应对日常负性生活事件的资源, 所以心理弹性得到了发展, 最终间接提高了主观幸福感。而使用表达抑制发挥的作用则相反。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 高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可能会使其感觉没有其它更有效的方式应对, 只能掩饰和压制情绪 (Brenning, Soenens, van Petegem, & Vansteenkiste, 2015)。

4.3 研究启示和局限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第一, 在情绪调节策略中, 认知重评是促进流动儿童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要素, 但对表达抑制的价值应持谨慎的态度, 应明确抑制情绪的情境和程度。第二, 要加强对流动儿童自尊和心理弹性等积极品质的培养, 从积极发展的角度提升幸福感。此外,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如横断设计解释因果关系不足, 在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上未考虑诱发情绪的具体事件或情境等。

5 结论

(1) 认知重评既显著正向直接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又通过正向预测自尊和心理弹性及自尊→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2) 表达抑制对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但通过负向预测自尊和心理弹性及自尊→心理弹性的序列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参考文献

- 蔡华俭, 丰怡, 岳曦彤. (2011). 泛文化的自尊需要: 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19(1), 1-8.
- 陈琴, 王振宏. (2014). 认知重评策略与生活满意度: 情绪和心理韧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2), 306-310.
- 程利, 袁加锦, 何媛媛, 李红. (2009). 情绪调节策略: 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 *心理科学进展*, 17(4), 730-735.

- 丁新华,王极盛.(2004).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12(1),59-66.
- 郭海英,朱婉灵,朱倩,朱茂玲,左培颖,林丹华.(2014).亲子沟通与农村青少年幸福感的关系: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0(2),129-136.
- 郝振,崔丽娟.(2014).受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中介机制及自尊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0(2),137-144.
- 何玲.(2015).流动儿童的抗逆力与自尊、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120-127.
- 侯舒轸,袁晓娇,刘杨,蔺秀云,方晓义.(2011).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7(4),401-411.
- 胡月琴,甘怡群.(2008).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心理学报》,40(8),902-912.
- 黄敏儿,郭德俊.(2002).原因调节与反应调节的情绪变化过程.《心理学报》,34(4),371-380.
- 教育部.(2016).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16-07-06取自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607/t20160706_270976.html
- 刘霞,赵景欣,申继亮.(2013).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45(5),568-584.
- 刘影,桑标,龚少英,丁雪辰,潘婷婷.(2016).情绪表达抑制功能的文化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4(10),1647-1654.
- 申继亮,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5).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31(1),108-116.
- 师保国,徐玲,许晶晶.(2009).流动儿童幸福感、安全感及其与社会排斥的关系.《心理科学》,32(6),1452-1454.
- 王芳,师保国.(2014).歧视知觉、社会支持和自尊对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动态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2(1),14-19.
- 王力,陆一萍,李中权.(2007).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5(3),236-238.
- 王力,张厚粲,李中权,柳恒超.(2007).成人依恋、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探新》,27(3),91-96.
-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 王中会,蔺秀云,黎燕斌.(2016).流动儿童心理韧性对文化适应的影响: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32(6),656-665.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
- Aldao, A. (2013). The future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 Capturing contex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2), 155-172.
- Brenning, K., Soenens, B., van Petegem, S., & Vansteenkiste, M. (2015). Perceived maternal autonomy support and early adolescent emotion regul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24(3), 561-578.
- Butler, E. A., Egloff, B., Wilhelm, F. H., Smith, N. C., Erickson, E. A., & Gross, J. J. (2003).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Emotion*, 3(1), 48-67.
- Cai, H. J., Wu, Q. P., & Brown, J. D. (2009). Is self-esteem a universal need? Evidenc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2), 104-120.
- Cohn, M. A., Fredrickson, B. L., Brown, S. L., Mikels, J. A., & Conway, A. M. (2009). Happiness unpacked: Positive emotions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by building resilience. *Emotion*, 9(3), 361-368.
- Diener, E. (2009). *The science of well-bei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 Diener*.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Gratz, K. L., & Roemer, L. (2004).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6(1), 41-54.
- Gross, J. J. (1998). 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3), 271-299.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2), 348-362.
- Haga, S. M., Kraft, P., & Corby, E. K. (2009). Emotion regulation: Antecedents and well-being outcome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ve suppression in cross-cultural sampl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0(3), 271-291.
- Haines, S. J., Gleeson, J., Kuppens, P., Hollenstein, T., Ciarrochi, J., Labuschagne, I., et al. (2016).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Strategy-situation fit in emotion regulation in daily life is associated with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2), 1651-1659.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Hills, P., & Argyle, M. (2002). The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A compact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3(7), 1073-1082.
- Hu, T. Q., Zhang, D. J., Wang, J. L., Mistry, R., Ran, G. M., & Wang, X. Q. (2014).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 meta-analysis review.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4(2), 341-362.
- Hughes, E. K., Gullone, E., & Watson, S. D. (2011). Emotional function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elevate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33(3), 335-345.
- Le, B. M., & Impett, E. A. (2013). When holding back helps: Suppressing negative emotions during sacrifice feels authentic and is beneficial for highly interdependent peopl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9), 1809-1815.
- Lee, B. J., & Yoo, M. S. (2015).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correlates of childr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8(1), 151-175.
- Lee, J. H., Nam, S. K., Kim, A. R., Kim, B., Lee, M. Y., & Lee, S. M. (2013). Resilience: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91(3), 269-279.
- Lerner, R. M., Lerner, J. V., Bowers, E. P., & Geldhof, J. G. (2015).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al-developmental-systems. In R. M. Lerner, W. F. Overton & P. C. M. Molenaa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pp. 607-651).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 Masten, A. S. (2014).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85(1), 6-20.
- Nezlek, J. B., & Kuppens, P. (2008). Regul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dail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3), 561-580.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uthwick, S. M., & Charney, D. S. (2012). The science of resili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Science*, 338, 79-82.
- Wright, M. O. D., Masten, A. S., & Narayan, A. J. (2013).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Four waves of research on positive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 adversity. In S. Goldstein & R. B. Brooks (Eds.), *Handbook of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15–37). Boston, MA: Springer US.
- Wu, G., Feder, A., Cohen, H., Kim, J. J., Calderon, S., Charney, D. S., & Mathé, A. A. (2013).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 *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7, 10.
- Ye, Z., Chen, L. H., Harrison, S. E., Guo, H. Y., Li, X. M., & Lin, D. H. (2016). Peer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protective role of resil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542.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Chai Xiaoyun¹, Guo Haiying¹, Lin Danhua¹, Liu Ying², Su Shuang¹

(¹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²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n enormous amount of research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investigating migrant children's depression, loneliness, discrimination, and risk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ical deficit model of adolescence, while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fers to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valuations of our lives. It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 Previous research showed that emotional problems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migrant children's life quality. So emotion regulation may be a linchpin for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Furthermore, high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are also the key protective factors for the children's development.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Y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get better insights into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e.,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and to test the possible mediating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639 migrant children aged 9–14 years old from three primary schools in Beijing were recruited for participation. The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the Oxford Happiness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Firstl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ere utilized to describ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variables. Then the multiple regressions were conducted to ac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s depicted in the hypothesized model. The sequential mediation effects were estimated by the PROCESS macro for SPSS.

A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appraisal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ion, self-esteem,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e migrant children. Sup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silience, but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self-esteem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elf-esteem,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directly predicted the migran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hile suppression did not. Besid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rough both the separate mediation path and the chained mediation path of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it was meaningful to invol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when explaining the migran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cognitive reappraisal is an effective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self-esteem,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by intervention. We have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value of suppression. Although some research showed that it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collective culture, it might not be beneficial to the migrant children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Thu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specific events migrant children may encounter when we make an intervention plan. Another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we should also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by developing their self-esteem and resilience, instead of just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their problematic behaviors.

Key words migrant children, emotion regulation, self-esteem, resilience, subjective well-being